



诗访大瑶山(外一首)

黄秉战

登圣堂山

登天不难,就是
沿着瑶人爬出的路
一步一梯把头颅抬高
今天并没有意外
身为人间来客
惊扰了山神,降下雨
放出一阵雾岚,让你
前不见人后不见树
当年,费孝通与王同惠遭遇过
今天,在茫茫群山间
他们的青春还在燃烧着火把
照亮青山,温暖一场千古

攀登海拔,浮在天空
原来仙境是这样
每一步都踩着一片云
同伴说别吵
听听是什么虫鸣
我才意识身在金秀
脚踏的是瑶山的土

山登绝顶,你是一座峰
放眼一声感叹
阳光苍苍茫茫
铺向天际,层峦那么广阔
刚好暮下人间社美

六中公路

王同惠迷路的崖壁
被拦腰切割,大瑶山
有了一条崭新的血脉
层层叠叠的砾岩
流淌紫铁色的光芒
路,遇到崖谷就打个弯
继续探开下一个崖谷
伸到六巷人的心坎
就有了平坦的远方

在路崖边,当一次盘王
巡视江山,只见莽莽林木
从谷底流向峰岭
学一声围猎的咒语
咕……呼……
在深幽浩瀚的山谷
野兽四处逃窜,群山
发出旷古的回音

红水河之恋

邹文彬

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儿时的趣事都逐渐淡忘了,唯独留在记忆深处的红水河嬉戏情景却难以忘怀,时常在脑海中闪现,重拾那些早已逝去的生活片段,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红水河像一条长长的玉带,缠绕着整个村庄,经年不息地流淌着。河面虽不算很宽,但河水却很深,河岸两旁长着一丛丛、一簇簇的刺竹,沿岸风光旖旎,素有“小三峡”之称。一放假,河畔村里的男孩子,就要到河滩上玩耍,在大人的陪伴下游泳、打水仗、摸鱼虾……我童年时光,就是在红水河的怀抱里度过的。

春天的红水河,像少女一样温柔腼腆。春风刚刚掠过,就有成群的鸟儿飞过来。一只只水鸟从高空疾冲而下,贴近水面轻轻点击,忽地腾空而起,直上云霄,那高超的飞行绝技,常让小伙伴们看得如痴如醉。河两岸桑园里的桑叶苍翠欲滴,村妇们边唱山歌边采桑,俨然一幅江南田园风光图。

当红水河两岸的木棉花谢的时候,夏天来了,雨也下得多了。河水一天天涨高,每逢发大水,肆虐的洪水有时会冲上岸来,淹没大片庄稼。而此时也正是捕鱼的好时节,红水河有鲜美的红河剑鱼、鲤鱼、鲫鱼……小伙伴们跟随

大人在河边钓鱼,等大人们网住稍大一些的鱼,我们便偷偷摸摸地用衣服包好,跑进竹林里捡些枯树枝,燃起篝火烤起鱼来,像馋猫似的吃得可香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小伙伴们们的秋天充满着浪漫情趣。大人们种下的红薯成熟了,我们便按捺不住解馋的欲望,每当傍晚,小伙伴们便汇集在岸边,有的挖红薯,有的搭红薯窖,有的捡柴火,然后把一个个硕大的红薯放进红薯窖里,点火一烧,袅袅轻烟伴随着红薯的清香钻入鼻孔,此时,大伙便你争我抢,吃得满脸都污黑。现在回味起来还直流口水。

冬天,寒风吹过,河两岸的草变得枯黄,竹叶也纷纷飘落。河水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哗,瘦瘦的一线细流。大人们怕河床太高,小孩在河边玩很危险,就不准我们到河边去玩。害得我们一个冬季都憋在家里,就差没憋出病来。

碧海桑田,星移斗转,红水河早已不是记忆中的那条河了。随着梯级电站的开发,河里的许多鱼种渐渐成了稀有动物,现在人们很少能尝到当年河里的剑鱼等佳肴了。尽管现在的红水河给人留下些许遗憾,但她毕竟传承了千年不变的景观,依然唱着亘古不变的歌谣,我们没有理由不爱她、不护她。



我喜向阳 (莫静摄)

父亲和自行车

章国永

初夏的傍晚在公园里跑步,看到踩着自行车锻炼的市民,我不禁想起父亲和他的自行车。

儿时的我,经常坐在父亲高高的自行车后座去赶集,一路上父亲很少下车推行,哪怕是那些看起来很陡的坡,父亲也能把车骑上去。那时我觉得父亲的力气特别大。

小学五年级时,经过初赛,我有幸和别校的一位同学代表全乡小学生到当时的来宾县城参加作文竞赛,据说我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能到县城参加竞赛的小学生。比赛的前一天,父亲骑着自行车送我到小平阳火车站坐火车去县城(当时小平阳火车站有绿皮火车停靠上下旅客),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多年后听母亲说,当时是9点半的火车,但那天5点多父亲就起床为我做好早餐,7点左右我坐上父亲那辆28寸“飞鸽牌”自行车向小平阳火车站出发。现在回想,父亲那么早起为我做准备,除了我能参加作文竞赛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外,就是他经常教导我们“只能人等车,不能车等人,凡事要提前做好准备”的行动体现吧。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出到村头的石桥拱前,父亲快速蹬着脚踏冲上坡后,对坐在车后的我说:“以后如果你能考上师范,毕业了能做一名老师就好了。”父亲

之所以有这样朴素的愿望,是因为他能接触到领工资的只有村里的老师。那天来到车站时还没到9点,没让我下车父亲就把自行车脚架撑好并对我说:“你坐在车上不要乱动,我去帮你买点车上吃的。”过了几分钟他从车站商店里提了个袋子出来,里面是两瓶水和几个烤包,这两样东西在上世纪80年代,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品。父亲一直在车边站着,带队老师到来后父亲才让我从车上下来,把袋子递给我时又塞给我三张十元“大钞”,临上车时再三叮嘱我要听从带队老师的安排。

1989年初中毕业参加中考,提交志愿表的前一天晚上,父亲那句“我觉得你还是做老师合适”的话,让我在上交志愿表前把第一志愿由“工商行政管理学校”改成了“师范学校”。分数揭晓时我是当年全校考生的第二高分,录取中师已无悬念,可我不是特别激动。开学前的日子父亲却格外忙碌,他把家里的四只鸭子全杀了,请来亲朋好友近三桌人到家中欢聚,在他看来,我能考取中师是他教子有方的又一成功体现。

在柳州就读中师三年,开学和放假我都是坐火车往返,每次往返都是父亲用自行车到小平阳火车站接送。中师第二学期放假,父亲的自行车换成了当时有名的“永久牌”28寸新自行车,车的大小和高度

都没变,但那时我觉得车已没以前那么高了。虽然是新车,父亲骑行却没有以前那么轻松,每每是弯腰低头使劲地蹬着脚踏,累得发际滴汗还是被别人轻易超过。出于对新车的好奇和被别人超车的不爽,我几次对父亲说:“爸爸,让我来骑,我搭你吧。”他每次都回答道:“新车,你骑不习惯的,以后买摩托车再搭吧。”我曾因为他的这句话不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认为父亲不相信将满18周岁的我,担心我把他的爱车弄坏。到后来才知道,那是父亲不舍得让我辛苦的说辞,“子以父为马”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于他心中。

中师毕业时我回乡做了老师,学校离家不过两三公里,可我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去也不愿在家多待。父亲隔三岔五以赶集路过为由,骑着自行车到学校给我送青菜或其他吃的,现在回想起来,内心唯一得到一丝安慰的,就是每次父亲到来时,只要没课,我都邀上两三位老师过来陪父亲喝上几口小酒。在低矮的瓦房内,同事们轮流向父亲敬酒时他开心的样子,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也许在父亲看来,这就是幸福人生的一部分吧。记得有一次,父亲两杯酒下肚后对我说:“你现在有工资了,以后咱们谁也不向谁要钱了,我做农活到70岁就不做了。”当时的我不知天高地厚,满口答应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也

这样做了。而父亲呢,虽然不再给我钱,但大米、青菜、花生油,有时甚至是半只鸡鸭,他都以环保、家里多吃不完浪费等各种借口往学校里送,我当然照单全收,却心安理得分文未付。

1999年冬天,父亲身体突然出现不适,骑自行车已没有以前那么利索,我陪他在附近的医院断断续续治疗,效果不太理想。2000年春季学期开学不久,我请假带父亲到柳州的医院检查治疗。在柳州医治了一个多月,病情没有好转,也许是父亲感到了什么,多次要求回家,最后我们决定回家用药。我们坐着绿皮火车回到小平阳火车站,这时的父亲已不能再骑自行车。父亲坐在我刚买不久的摩托车上,我开车他坐后座。回家后我白天上课,晚上回家陪父亲,遇到有晚自习,下晚自习后再晚我都赶回家。2000年4月底,父亲没有遵守他“做农活到70岁就不做”的“诺言”,离开了他深爱着的妻子和儿女。

父亲去世后,他的自行车一直放在老家,后来我调到城区的机关工作,自行车就存放在大姐家里。大姐原说好的今年春节将车骑回来,但因疫情防控不能串门而未成行。

疫情已慢慢散去,希望父亲在那边不再有病痛,和我们生活的国度一样太平、幸福。



日出东方 (何家政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黄耀珠

“疫情无情人有情”,单位的防疫自愿捐款活动,让我感受尤深。

3月9日,我单位按照上级的部署,发动本支部的退休党员自愿捐款支持防疫工作。当天,作为支部组织委员,我协助农副书记在会议室接受大家的自愿捐款。

其间来了一男一女。我一看,是退休党员蒙庆良、梁玉华夫妻。他俩两年来交过一次党费,说是准备去和子女一起生活了,特地赶过来交党费,以免超期。我拿起笔摊开登记表,轻声问他们捐多少。

“300。”梁玉华一边说,一边把钱递过来。“太多了”,我心里叫道,嘴里便说,“你们交100元就行了。”顺手把200元退回给她。

“我们就交300元。”梁玉华又把钱塞进我手里。我看看他们,满头白发,满脸

皱纹,并且非常瘦弱,心想他们平时肯定要花不少钱来看病。我于心不忍,把那200元钱放回,站起身向外走去:“抗击疫情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每个人都自愿捐一点,都出一份力就行了,你们每人捐50已经够多了。”但梁玉华拿起钱,不依不饶地追了出来。

“既然他们要捐,那就收吧,那是他们作为党员的心意。”农副书记劝我道。

我转念一想,对啊,我有什么权利拒绝一个党员善良的意愿呢?只好说:“那就算你们每人捐150元吧,我马上登记。”

“不,这份是我的。”梁玉华却摆摆手,然后盯着老伴蒙庆良说,“你那份呢?快拿出来吧。”

“还有啊?”我愣住了,“不不,你们平均每人150元够多了,不用再捐了。”

但蒙庆良依然又把200元钱放到我面前。我看看农副书记,他沉思了半晌说:“组织上得尊重党员的意愿,谢谢你们了。”

于是蒙庆良、梁玉华夫妻共计捐款500元,成了我们党支部抗击疫情自愿捐款最多的党员。我和农副书记怀着感激敬佩的心情和他们攀谈起来:梁玉华很多年前就因病提前退休了,现在工资每月只有2000多,身体小毛病也不少,平时主要帮儿子带孙子,前几天刚从外地回来。

“你们儿子在哪工作的?”农副书记问。

“中科院。”

中科院人员,那可是万里挑一的栋梁之材啊!我们不禁对眼前这对普普通通的老人肃然起敬:“他叫什么名字,以前在哪读的大学?”

“蒙青林,不记得他哪个大学毕业了,他大学都读了四个。”梁玉华答道。

送走两位老人,我上网搜索“蒙青林”的简要事迹,发现确有其人。资料显示:蒙青林2003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本科学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广西大学,获微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2011年11月进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究方向是结核分子标识,具体目标是潜伏性结核感染miRNAs研究;201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苏州医工所……

看完资料,我不禁思绪飞扬:从两位老人的品行来看,他们善良的本性是生俱来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们的善举,想必影响着蒙青林,带动他勇攀高峰,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扶贫路上不停歇

何鑫

我与同事小韦驱车在去扶贫的路上。细雨绵绵,乍暖还寒,初春伊始,我的思绪随着车轮碾压水花的喇喇声遥望车窗窗外,一下子又回到几年前,正是那时,我国正式吹响了精准扶贫的号角,拉开了精准扶贫的帷幕。

近几年来,在市扶贫办的指导下,我局扶贫联系点工作也取得了关键性的阶段胜利,定点扶贫村兴宾区石陵镇感龙村由原来的60户贫困户,减到了4户。

根据工作安排要求,年后我和单位小韦下到联系点看望帮扶对象,了解近段被帮扶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子女就业就学情况。在前往被帮扶对象家之前,驻村第一书记韦家岭热情

地在村委会办公大楼门口迎接我俩。掰手一数,韦书记已在感龙村扶贫两年有余。坚毅的面庞略微透露着几许疲惫,韦书记简要向我们说明了被帮扶对象近期农业生产创收情况,以及被帮扶对象近期疫情期间生产劳作方面的需求及动态。在阅看了生产情况收入表之后,寒暄几句,顾不上舟车劳顿,我们前往被帮扶对象黄哥家中。让我更惊喜的是,黄哥比上次我们下来看望他的时候,脸上多了丰收喜悦的笑容,刚一踏进他家门,他就热情地迎了上来:“小何你好,你刚才打电话给我时,我还在田里做着工呢,争取在这疫情过后翻新一下田里新土,让来

年的春耕更好的劳作。”

黄哥膝下两个儿女,大女已在钦州市教书育人,虽然小儿子今年要上高三了,但今年的负担比往年明显减少。进入黄哥家中,我们发现,黄哥家里的摆设也多了一些变化:添置了一套新式的木沙发,家中摆件也拾掇得井然有序。促膝交谈中,我明显感觉到黄哥对来年充满信心。趁着黄哥填写帮扶手册之际,我踱步到他家门外。日近晌午,却还在下着蒙蒙细雨。眺望远方,山雾缭绕,但却可看见一些群众冒雨外出忙活的身影。“多么勤劳的人们啊!”我若有所思,不禁握紧了拳头。

临别黄哥,他一直坚持送我们到村口

方才归去。等到我与同事小韦赶回村委时,韦书记他们几位与联络员都已不见踪影。我想,他们定是在赶往扶贫的路上。

不久,我与小韦也驱车回了市区。遥望车窗窗外,雨点轻轻拍打车子侧窗的声音,再次让我的思绪陷入对扶贫工作的深深思索中。扶贫之路,任重而道远。在扶贫路上,我们无需停歇,不获全胜,是决不会收兵的。

